

论《刘子》作者问题

林其铤 陈凤金

《刘子》，又称《新论》、《刘子新论》。从历史著录看，尚有《流子》、《德音》、《云门子》、《石匏子》等别称。此书虽非鉅帙，但它“泛论治国修身之要，杂以九流之说”^①，“明阴阳、通道德、兼儒墨、合名法、苞纵横、纳农植，触类取与，不拘一绪”^②，内容遍涉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艺等各个领域。并且，“篇中引物连类”，“事多见传记”^③，所以它保存的材料及反映的思想是颇为丰富的。此书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，从今传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历代官、私书目多有著录，而且还为多种丛书和类书所收入。

《刘子》也是一部在历史上争议颇多，至今好多问题仍成悬案的古书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此书的作者归属问题。

关于《刘子》的作者，历代众说纷纭，有的认为是梁东莞刘勰，有的说是北齐阜城刘昼，也有主张是汉刘歆、梁刘孝标、唐袁孝政，或东晋时人、贞观以后的人等等。从唐代以来，争论了一千多年，迄今尚无定论。说法虽然很多，但争议的焦点，集中在刘勰和刘昼二人身上。从历代的著录情况看，宋代以前肯定刘勰著的居多，主张刘昼著的实属个别；宋人多数则于刘勰、刘昼之间持存疑态度；明、清两代不少版本干脆避开作者问题，只署

《刘子》注者的姓氏而不题作者姓名。近人余嘉锡等是否定刘勰、肯定刘昼的；但王重民等又力主《刘子》为刘勰所著。大概是由于对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感到棘手，许多研究刘勰和《文心雕龙》的专著和文章，大都撇开《刘子》作者的争议，或者姑仍《刘子》非刘勰所著之说，不再提起《刘子》，这样也就似乎约定俗成：

《刘子》不是刘勰的著作成为定论了。这当然是有欠公允的。我们认为：尽管真正解决这一历史悬案比较复杂，但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考证和研究，通过一番认真的讨论，问题总是有希望得到正确解决的。辨明《刘子》作者谁属，这不仅对于研究《刘子》，而且也对研究刘勰及其《文心雕龙》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正是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在整理《刘子》一书的同时，对《刘子》的历代著录、版本、作者谁属的争议，《刘子》思想内容同刘昼思想、刘勰思想及其《文心雕龙》的关系等方面，也作了一些考证和研究。我们初步得出的结论是：北齐刘昼不可能写出《刘子》，《刘子》的作者应为刘勰。

一、前人否定刘勰肯定刘昼提出的根据和理由

如上所述，前人关于《刘子》作者归属问题，众说纷纭，但主要集中于刘勰或刘昼二人。

前人怀疑或否定刘勰著《刘子》提出的理由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：

(一) 史传不载。“史惟称其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不云更有别书”。④

(二) 关于“北音”起源说法不一。“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称：‘涂山歌于候人，始为南音，有娥谣乎飞燕，始为北声，夏甲呶于东阳，东音以发，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兴。’此书（按：指《刘子》）《辨乐篇》称：‘夏甲作破斧之歌，始为东音’与勰说合；

其称‘殷辛作靡靡之乐，始为北音’则与总说迥异，必不出于一人。”⑤

(三) 刘勰长于佛理，《刘子》归心道教，志趣迥殊。“又史称：勰长于佛理，尝定定林寺经藏，后出家改名慧地。此书（按：指《刘子》）末篇，乃归心道教，与勰志趣迥殊。《白云雾道藏目录》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，其非奉佛者明甚。”⑥

(四) 《刘子》的文笔和卷数，与《文心雕龙》不同。“《刘子》五卷五十五篇，……《唐志》十卷，直以为刘勰。然观刘勰所著《文心雕龙》，辞旨伟丽，且又卷数不同，非也。”⑦

前人据上述主要理由否定刘勰著《刘子》的同时，又提出下面四点主要理由来肯定刘昼著《刘子》：

(一) 唐人早有此说。宋以后主刘昼著《刘子》的论者，大多数引用陈振孙录存的唐袁孝政《刘子注序》的残文为据。袁《序》残文云：“昼伤已不遇，天下凌迟，播迁江表，故作此书，时人莫知。谓为刘勰、刘歆、刘孝标作。”近人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辩证》怀疑并否定袁《序》的论点，但又以宋刘克庄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一百七十九《诗话续集》所引唐张鹭的《朝野僉载》中的一条材料为据云：“始知初唐人早有此说”，因而断定“此书实昼所撰”。《后村大全集》所引《朝野僉载》云：“《刘子》书，咸以为刘勰所撰，乃渤海刘昼所制。昼无位，博学有才，窃（按：窃字原缺作“□”，今依《四库提要辩证》引文补。）取其名，时人莫知也。”余嘉锡又据以提出《刘子》是“刘昼托名刘勰”所著的说法。⑧

(二) 《刘子》某些篇章的一些言论，同刘昼的遭遇相合。“其《知人篇》曰：‘世之烈士愿为君授命，犹瞽者之思视，⁽¹⁾聋者之想行，而目终不得开，足终不得伸，徒自悲夫。’其《荐贤篇》曰：‘贤士有胫而不肯至，殆蠹材于幽岫，毁迹于柴草者，盖人不能自荐，未为之举也。’又曰：‘臧文仲不进展禽，仲尼谓之窃

位；公孙弘不引董生，汲黯指谓妒贤，虞邱不荐叔敖，樊姬贬为不正；东阆不达髦士，后行不正于路。故为国入宝，不如能献贤。献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斯前识之良规，后代之明镜矣。’盖昼求秀才十年不得，及被举，又考策不第，上书亦不见收录，竟无仕进，伤时无知己，多窃位妒贤，故有此言。”⑨

（三）《刘子》一些篇章词气和刘昼撰《高才不遇传》之意相同。“其《通塞篇》曰：‘命有否泰，遇有通塞，否与泰相翻，屈与伸殊贯，邀泰遇伸，不尽叡智，遭否会屈，不专肤蔽。何者？否泰由命，屈伸在遇也。’其《遇不遇篇》曰：‘贤有常智，遇有常分，贤不贤性也，遇不遇命也。性见于人，故贤愚可定；命在于天，则否泰难期。命运应遇，危不必祸，遇不必穷；命运不遇，安不必福，贤不必达。故患齐而死生殊，德同而荣辱异者，遇不遇也。’此二篇词气愤激，与其撰《高才不遇传》之意同，所谓发情著名也，此其证二也。”⑩

（四）刘昼诋佛而不非老、庄，同《刘子》归心道家相合。“《北齐书》及《北史》均列昼于儒林，不言其为老、庄之学。然此书中若《清神》、《防慾》、《去情》、《韬光》等篇，多黄老家言……是昼之为人诋佛而不非老、庄，盖自昌黎未出以前，凡辟佛者，皆老氏之徒，即傅奕亦然，情有所偏，遂入主出奴耳。昼好老、庄之学，故上书诋佛，此书之归心道家以此也。此其证三也。”⑪

以上便是否定刘勰和肯定刘昼的具有代表性的理由，这些理由是否充足？需要联系历代著录的事实，以及勰、昼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加以考察。

二、十岁左右的刘昼有可能写成《刘子》吗？

前人肯定《刘子》为北齐刘昼撰的四点理由，概况起来无非

是两个方面的：一是唐人早有此说；二是《刘子》的思想内容同刘昼的身世思想吻合。现分别考辨如下。

关于“唐人早有此说”问题，据我们了解，宋以前的官、私著录，大多数都是肯定《刘子》为刘勰所著，而主张《刘子》为刘昼所著只有张鷟和袁孝政，并且他们所著的原书都早已亡佚，现在所据的都是宋人的转引。例如：上述张鷟的意见，仅见于宋人刘克庄的《后村大全集·诗话续编》，而今流传的张鷟所著《朝野僉载》并没有关于《刘子》的这一条。袁孝政的《刘子注·序》，也早已不传，后人引以为据的也只是宋人陈振孙的引录。但据今能直接见到的唐人著录，倒是一致认为《刘子》的作者是刘勰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刘子》著录，未标作者姓氏，但标明“梁有《刘子》十卷，亡”。释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：“刘勰，梁朝时才名之士也，著书四卷，名曰：《刘子》。”近代发现的敦煌遗书中，不仅有多种《刘子》写本残卷，而且有《刘子》著录材料。

《随身宝》有“《流子》刘协注”。《杂抄》在全录《刘子》第五十五篇文后注：“事在《流子》第五十五篇。”^⑫所以，用宋人引录的两条材料作为根据，而把今天尚可看到的许多唐人著录事实置于不顾，便否定刘勰、肯定刘昼，恐怕是不那么可靠的。至于《刘子》为“刘昼托名刘勰”所著之说，连附和《刘子》为刘昼所著的台湾省学者王叔岷先生也认为是难以成立的。他说：“昼既不得真赏于当时，惟有求知音于后世，若窃取刘勰之名以传其书，则并身后之名亦不可得矣，昼之愚不致如此。”^⑬我们同意王先生的说法，但尚需补充的是：（一）刘勰在南北朝时期的地位并不高，《文心雕龙》之得到重视是唐以后的事。所以，刘昼欲窃取刘勰之名以自广，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。（二）刘昼是南北朝时期激烈的诋佛者，从现存的诋佛言论看，他对佛教徒是极端鄙视和卑视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名字和言论是被佛教徒列入“另册”的，这有《广弘明集·叙列代王臣滞惑解》为证。而刘勰最终

是以遁入空门皈依佛祖削发为僧改名慧地为归宿的，像刘昼那样以“董仲舒、公孙弘”自命、自视颇高的人，怎样会窃取自己所不齿、当了和尚的人的名字以广自己的著作呢？还有，以“昌黎未出以前，凡辟佛者皆老氏之徒”为前提，推论出：“昼既诋佛必是‘昼好老、庄之学’、而‘此书（按：指《刘子》）之归心道家’，则此书必刘昼著。这样的推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，因为它与史传‘列刘昼于儒林，不言其为老、庄之学’的记载不符。比如北魏时的李瑒，即以‘儒家人文主义观点斥佛为‘鬼教’，虽经‘自理’（即‘自白’与‘自首’中间的‘自明’）终被罚金一两’（《魏书》卷五三本传）^⑭。”这就说明：“昌黎未出以前”辟佛者未必“皆老氏之徒”。

关于《刘子》一书的思想内容，是否同刘昼的身世、思想一致，那就要以多方面加以考察了。

刘昼的事迹，主要见载于《北齐书》和《北史》的本传，此外，在《北齐书·儒林传叙》和《广弘明集·叙列代王臣滞惑解》亦有零星记载。根据现有的史料，刘昼的生平大致是：（1）“少孤贫爱学”，“与儒者李宝鼎同乡里，甚相亲爱，宝鼎授其《三礼》，又就马敬德习《服氏春秋》，俱通大义。”（2）因“恨下里少坟籍，便仗策入都，知鄴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，乃求为其子博士，恣意披览，昼夜不息。”（3）“举秀才，策不第。乃恨不学属文，方复缉缀辞藻，言甚古拙。”（4）“求秀才十年不得，发愤著《高才不遇传》；冀州刺史郗伯伟见之，始举，时年四十八。”（5）“孝昭（公元560年至561年）即位，好受直言，昼闻之喜曰：‘董仲舒、公孙弘可以出矣。’乃步诣晋阳上书，言亦切直，多非世要，终不见收采，编录所上之书为《帝道》。”（6）“河清（北齐武帝年号，仅三年：公元562年至565年）中，又著《金箱壁言》，盖以讥政之不良。”（7）“天统中，卒于家，年五十二。”^⑮

根据上述记载，联系其他有关材料，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刘昼

的思想作风是：（1）是典型的经生，出于大儒徐遵明的门下。这一学派皆宗郑康成，是属于保守汉儒繁琐经学的。正因为刘昼师承徐遵明学派，所以他以“董仲舒、公孙弘”自命。（2）为人孤高，好说大话。《北史》本传载：“昼常自谓博物奇才，言好矜大，每言‘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，不易齐景之千驷也。’容止舒缓，举动不伦。”又云：“刺史陇西李琦亦尝以昼应诏，先告之。昼曰：‘公自为国举才，何劳语昼？’齐河南王孝瑜闻昼名，每召见，辄与促膝对饮。后遇有密亲，使且在斋坐，昼须臾径去，追谢要之，终不复屈。”（3）诋佛甚力，为北朝著名的排佛者之一，对道教亦有微言。《广弘明集·叙列代王臣滞惑解》载：“刘昼，渤海人，才术不能自给，齐不士之，著《高才不遇传》以自况也。上书云：‘佛法诡诞，避役者以为林藪’”。又云：“道士非老、庄之本，籍佛邪说为配坐而已。”（4）文风古拙。据《北齐书》本传记载，刘昼文章，“言甚古拙。制一首赋，以《六合》为名，自谓绝伦，吟讽不辍。……曾以此赋呈魏收，收谓人曰：‘赋名《六合》，其愚已甚，及见其赋，又愚于名。’”《北史》本传又载：“昼不忿又以示邢子才。子才曰：‘君此赋似疥骆驼，伏而无妩媚。’”

《刘子》一书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广泛领域。尽管贬之者说它“无甚高论”，但也承认它“然时时有可喜者。”^{①⑥}《刘子》的语言风格，或誉之为“罽雨轻蓑”，或讥之为“词颇俗薄”，但公认它“语亦颇显浅”，意即行文通俗流畅。所以，像刘昼那样一生同经书打交道，根本没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的社会实践经验，并且写起文章来，“古拙”得“似疥骆驼，伏而无妩媚”，这怎么能同《刘子》的内容及其语言风格对得上号呢？前人一再援引袁孝政《序》和摘录《刘子》某些篇章对现实的某些微言和激越词气作为根据，以为这同刘昼怀才不遇的身世及其著《高才不遇传》的意思吻合，从而断定《刘子》必为刘昼所作。刘昼著的《高才不遇传》只见著录不见其书，原书早

已失传了，内容究竟如何不得而知。但就其怀才不遇而对现实不满的情况看，在封建社会里，特别是在那门阀制度森严、士庶不可逾越的南北朝时期，有这种遭遇和思想的，应该说是太多了。所以《刘子》一书中这方面思想内容是社会存在的反映，不能单指刘昼个人。如果真要联系刘昼的思想风格来考察《刘子》，我们到可以举出许多事实，证明它不仅不合，而且简直是背道而驰的。比如，从上面所引史传记载关于刘昼同刺史李琦，特别是同河南王孝瑜交往的事实，可以看出：刘昼性格孤高，不阿权贵。像这样清高孤傲的人，怎么能够设想会在《刘子》一书写出公然论证并鼓吹投靠权贵、攀附达官，以成其事、以就其名的《因显》、《托附》等篇章？又如，刘昼是激烈的诋佛者，而《刘子》五十五篇，从头至尾，不但找不到任何诋佛的思想和言论，相反到可以找到同《弘明集》牟融的《理惑论》合拍的论点和材料，而且《广弘明集》的编撰者释道宣，不但在《九箴篇》中并引《刘子》、《文心》入注，而且在《叙列代王臣滞惑解》中，还用《刘子》的话来斥责刘昼。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三《九箴篇》“圣教绵远，终使鼠璞滥名；玄化幽微，遂令鸡凤混质”。上句原注是：“《刘子》云：‘周人谓死鼠为玉璞。’”（按：出自《刘子·审名篇》，原文是：“周人玉璞，实是死鼠。”）下句原注是：“《文心》云：‘楚人以山鸡为凤。’”（按：出自《文心雕龙·知音篇》，原文是：“楚人以雉为凤。”）《广弘明集》卷六《叙列代王臣滞惑解》记刘昼诋佛言论之后斥之云：“孔子见人一善，而亡其百非；鲍生见人一恶，而终身不忘。狂哲之心，相去远矣。”此段话在《刘子·妄瑕篇》作：“仲尼见人一善，而忘其百非；鲍叔闻人一过，而终身不忘。夫子如斯之弘，鲍叔如斯之隘也。以是观之，圣哲之量，相去远矣。”从上述材料可以设想：如果《刘子》一书有刘昼诋佛思想的反映，或者释道宣认为《刘子》是其教敌刘昼所著，那么，坚守扬佛抑道门户、冤亲无等的释道

宜，反把《刘子》引为同调，这是可能的吗？

我们以为：肯定《刘子》非刘昼所著，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史志关于《刘子》一书的著录事实了。

《刘子》最早的著录，见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在《隋志》子部杂家类杨伟《时务论》条下有：“梁有《刘子》十卷，亡。”的记录。《隋志》所本，据其自叙，是以残缺的“伪郑”图书目录为基础，对照在底柱漂没之后残存的图书实物，并且“远览马《史》、班《书》，近观王、阮《志》《录》”进行了一番考订之后撰写而成的。这里所谓“王阮《志》《录》”者，便是南齐王俭的《七志》和梁阮孝绪的《七录》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认为：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刘歆《七略》而作，班固已有自注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参考《七录》，并注存佚，亦沿其例。”^{①⑦}清人钱大昕《隋书考异》也说：“阮孝绪《七录》，撰于梁普通中，《志》（按：指《隋志》）所云梁者，阮氏书也。”^{①⑧}清乾嘉学者章宗源和清末学者姚振宗，均治《隋书·经籍志》者，并有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专著。章宗源肯定：“《隋志》依《七录》，凡注中称‘梁有今亡’者，皆阮氏旧有。”^{①⑨}姚振宗则有《刘子》的具体考证，他的结论是：“此《刘子》似非刘昼。昼在北齐孝昭时著书，名《帝道》，又名《金箱壁言》，非此之类。且其时当南朝陈文帝之世，已在梁普通后四十余年，阮氏《七录》作于普通四年，而是书见载《七录》，其非昼所撰更可知。”^{②⑩}阮孝绪的《七录》已失传，但《七录序》见载于《广弘明集》卷三，《序》末署“有梁普通四年撰。”

今考《北齐书》刘昼本传载：“天统中，卒于家，年五十二。”新编《辞海》和近出的《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》所附的《中国哲学家生卒年表》，都把刘昼的卒年“天统中”确定为“天统元年，即公元五六五年，亦即陈文帝天嘉六年，然后上推五十二年，即北魏延昌三年，亦即公元五一四年、梁天监十三年，为刘昼的

生年。而郑振铎编的《中国文学年表》(载于《中国文学研究》)则定刘昼生年为北魏延昌二年,即公元五一三年,亦即梁天监十二年。由此可见,当阮孝绪《七录》书成并于梁普通四年(公元五二三年)撰成《七录序》的时候,北齐的刘昼年方十岁或十一岁。试问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,那怕有再大的天才,能写出如《刘子》这样“泛论修身治国之要”的书吗?

总之,无论是从《刘子》一书的著录事实考察,还是将刘昼的思想风格与《刘子》的内容两相对照,都比较充分地证明了:《刘子》不是刘昼所著的。

三、《刘子》为刘勰著应该肯定

前人怀疑或否定《刘子》为刘勰所著而提出的四个主要理由,其中有些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,对此前人也已有辨难。比如关于“史惟称其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,不云更有别书。”的说法,就与事实不符。《梁书》刘勰本传记载:“勰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”,并“文集行于世”。现在被公认是刘勰著作的,除了《文心雕龙》外,还有《灭惑论》、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,“余如僧佑《出三藏记·法集杂记铭目录》所列《钟山定林寺碑铭》一卷,《建初寺初创碑铭》一卷,《僧柔法师碑铭》一卷,及慧皎《高僧传》所言:释僧佑、释超辩两碑文,皆只见其目,文已亡佚。若目亦不得见者,更不知凡几?”^②既然史载有“文集行于世”,又有这么多未被本传列举现已证实是刘勰著作的书文例证,怎么不可以认为《刘子》五十五篇亦属其“文集”的一部分呢?又如关于《刘子》卷数与《文心雕龙》不同问题,《文心雕龙》分为十卷,而现在见到的《刘子》有不分卷、分上下卷、分三、四、五、十卷等的差别。《刘子》书名有《新论》、《刘子新论》等别称,前人已辨其乃晚出,即是《刘子》,恐怕

也是后人的追题。至于卷数的多种分法，显然是后人所为。《刘子》五十五篇，究竟是在刘勰生前即已成书，抑或是后人从其《文集》中加以辑录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再如关于“北音”问题，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称：“有娥谣乎飞燕，始为北声”；《刘子·辨乐篇》称：“殷辛作靡靡之乐，始为北音”。前人有以两书说法不一，从而断定两书“必不出于一人”。其实，两部书谈这一问题的前提是不同的：《文心》谈的是“乐”的起源；《刘子》说的是“淫乐”（“溺音”）的起源。正因为所论的前提不一，所以前者采用了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的说法，东西南北音并提；后者则取之于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，只提东音和北声，紧接着便是“郑卫之俗好淫，故有漆洧桑中之曲。”关于溺音（淫声）的起源问题，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有一段诠释：“启子太康之铸鸣鳧磬，已非正声。在后孔甲好音，殷辛为淫声以变正声，是音之不雅，自古有之矣。”^②两书讨论的对象不同，不能以此断为两书非出一人之手。这正如王叔岷《刘子集证自序》所说：“一人之著述，有时所用故实，来源非一，亦难免抵牾，故《提要》（按：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）前说，尚不足以确证《刘子》不出于刘勰之手。”^③

除了上述诸点之外，否定《刘子》是刘勰所著的最主要理由便是“勰长于佛理”，“此书末篇，乃归心道教，与勰志趣迥殊”。但要讨论这一问题，就不能不联系南朝的社会思潮、学术风气、以及刘勰生平和思想变化来加以考察了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说过：“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，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。”^④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《致斐·拉萨尔的信》中还说：“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，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，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，而正是从他们处所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”。^⑤马克思、恩格斯

的原则指示，对我们研究《刘子》作者谁属问题，同样具有指导意义。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潮流来考察《刘子》同刘勰的关系，最好还是采取鲁迅先生提倡的：“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全人，以及它所处的社会状态”的方法加以研究，否则，的确“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”。^{②6}

刘勰一生，历经宋、齐、梁三个朝代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，继春秋战国之后，又一次大变动的时代。刘勰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，特别是南朝这个特定的环境，有两个同学术思想直接有关的特点是值得重视的：第一，门阀等级制度禁严。“尔时之人，其文名籍甚者，多生于华宗贵胄，布衣之士，不易见重于世。……刘毅已有‘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’之议，宋、齐以来循之未败。”^{②7}第二，晋代以降，《周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之学盛行，佛经也大量翻译东来，“南朝儒生采取《老》《庄》创造新经学”^{②8}，“玄学佛理，实相合流”^{②9}，“说体则虚无之旨可渗入《老》《庄》；说用则儒在济俗，佛则治心，二者亦同归而殊途”。^{③0}在这种儒、道、佛彼此对立，而又互相渗透的客观形势之下，梁武帝萧衍从巩固其自身统治地位出发，采取了“三教兼弘”的政策，唱起“三教同源”论，“用儒家的‘礼’（《孝经》引孔子说：‘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’）来区别富贵贫贱；用道家的‘无’（刘向论道家‘清虚无为，务崇不竞。’）来劝导不要争夺；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，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，为什么不要争夺。”^{③1}上述南朝时期的两个特点，不能不给刘勰的思想打上时代的烙印，也不可能不在其著述中留下痕迹。

刘勰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他在青、壮年时期是颇有宏伟的政治抱负的。他的人生观是：“穷则独善以垂文，达则奉时以骋节。”^{③2}他认为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”^{③3}，主张：“大夫处世，怀宝挺秀，辨雕万物，智周宇宙。”^{③4}“君子藏器，待时而动，发挥事业，固宜蓄素以弭中，散采以彪外，梗枏其质，

豫章其干，摛文必在纬军国，负重必在任栋梁。”^{③⑤}他是雄心勃勃，立志要使自己成为社会栋梁的。他写《文心雕龙》是感于“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”^{③⑥}他提倡：“士之登庸，以成务为用”，所以他说：“安有丈夫学文，而不达于政事哉！”^{③⑦}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从政。正因如此，《文心雕龙》一杀青，他便以它作为仕进的敲门砖，不惜屈身投靠官居骠骑司马的沈约：“乃负其书候约出，干之于车前，状若货鬻者”。^{③⑧}刘勰的这一举动，与《刘子》中《因显篇》和《记附篇》所鼓吹依附权贵的理论是合拍的。

尽管刘勰有宏伟的政治抱负，尽管他任太末令时已显露了他的从政才华，也尽管他不惜屈身投靠权贵，但是他出身贫寒、社会地位低下，森严的门阀制度成了他仕途上不可逾越的障碍。虽然他的《文心雕龙》受到了沈约的赏识，可是，在他的一生中，至多也只能充任那些既无位、也无权的空官和小官。他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，看破了红尘，皈依了佛祖，在定林寺当了和尚。一代风流，连生卒年月都混于无闻。这是一个悲剧，也是那个时代广大寒庶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。

前人常以刘昼无位、伤己不遇的身世和《刘子》《知人篇》、《荐贤篇》、《通塞篇》、《遇不遇篇》等的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加以比附，肯定《刘子》为刘昼所著，否定刘勰所著。其实，只要我们稍为深入地研究一下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，以及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，我们不难发现《刘子》中的这些思想，正是当时社会现实和下层知识分子普遍思想情绪的反映。我们不妨一读刘勰之《文心雕龙·程器篇》，他写道：“古之将相，疵咎实多：至如管仲之盗窃，吴起之贪淫，陈平之污点，绛、灌之谗嫉，沿兹以下，不可胜数。孔光负衡据鼎，而仄媚董贤，况班、马之贱职，潘岳之下位哉！王戎开国上秩，而鬻官鬻俗，况马、杜之馨悬，丁、

路之贫薄哉！……盖人禀五材，脩短殊用，自非上哲，难以求备。然将相以位隆特达，文士以职卑多诮，此江河所以腾涌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。”刘勰这些言论，曾被纪昀斥为：“此亦有激之谈，不为典要。”^{③⑨}而鲁迅先生则肯定它：“东方恶习，尽此数言。”^{④⑩}

前人以《刘子》末篇“乃归心道教，与勰志趣迥殊”来否定《刘子》为刘勰所著，这没有“顾及作者全人以及它所处的社会状态”。南朝的社会思潮特点已如前述，它同北朝有很大的区别。鲁迅先生曾把“通脱”作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之一。什么叫“通脱”？“通脱即随便之意。”^{④①}一般地说，南朝无论是经学还是佛教，都不像北朝那样保守宗门，排斥异学。“南朝人士偏于谈理，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。内外之争在理之长短，辩论虽激烈，然未当如北人信教极笃，因教争而相毁灭也。”^{④②}所以刘勰在《刘子·九流篇》提出“道者玄化为本，儒者德教为宗”，“今治世之贤，宜以礼教为先；嘉遁之士，应以无为是务”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当然，在这里我们首先应把道家同道教相区别：道家乃老、庄的哲学思想；道教是托名于黄老渊源于古代巫术的神仙方术。我们从刘著中可以看到：他反对过道教，但没有反对道家。相反，他在《文心雕龙》中，对道家的创始人及其学说，都作了很高的评价。《诸子篇》云：“鬻熊知道，而文王咨询，徐文遗事，录为《鬻子》；子自肇始，莫先于兹。及伯阳识礼，而仲尼访问，奚序《道德》，以冠百氏。然则鬻惟文友，李实孔师，圣贤并世。而经子异流。”看，这里把道家的创始人奉为儒家创始人的师友，甚至连他参与佛道之争、华夷之辩的《灭惑论》，也只是反对道教，而不反对道家的。不但如此，而且“文中处处流露了玄言之风，带有玄佛并用的浓厚色彩”；“文中凡论述儒释道三家关系时，悉本三教同源之说。”^{④③}更有意思的是：连《文心》之命名，亦儒道并用，两家同源。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一开头便宣

称：“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。昔涓子《琴心》，王孙《巧心》，心哉美矣，故用之焉。”涓子者谁？即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提到的环渊，他的著作名《琴心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《蜚子》十三篇自注：“名渊，楚人，老子弟子”。又，儒家《王孙子》一篇自注：“一曰《巧心》。”这不就同《刘子·九流篇》所云：“道者玄化为本，儒者德教为宗，九流之中，二化为最。”正相吻合么？

《刘子》与《文心雕龙》就其内容说，是两部不同性质的书，前者“泛论修身治国之要”，后者“言为文之用心。”但是，我们如果透过两书各自阐述的具体内容，就会发现它们在思想方法论以及材料选择、“分类铸词”方面的许多相同之点。关于这一情况，在前人中已有不少人是看到了的。因此他们肯定：“（《刘子》）文体与此（按：指《文心》）正类，其可徵不疑”。^④“其分类铸词，尊仲尼卑百家，一似《文心雕龙》。”^⑤“其语类《文心雕龙》”^⑥等等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我们不仅可以在两书中找到思想内容基本相同的对应篇章，如《清神》与《神思》《养气》，《辨乐》与《乐府》，《正赏》与《知音》，《九流》与《诸子》等等；而且也可以在两书中找到许多观点和材料使用方面的对应点。因限于篇幅，只能略举数端，以资佐证。例如：

（1）“自然之质”、“自然之性”“自然之教”与“自然之道”、“自然之趣”、“自然之势”：（按：前者为《刘子》论点，后者为《文心》论点，以下诸条同此，不赘。）

（2）“理为言本”、“实为名源”与“心与理合”、“检迹知妄”；

（3）“画鬼魅者易为巧，摹犬马者难为工”与“意翻空而易奇，言徵实而难巧”；

（4）“情之变动自外至”与“人禀七情应物斯感”；

（5）“先质后文”与“依情待实”；

（6）“各像勳德应时之变”与“时运交移质文代变”；

（7）“因时制宜”与“趋时必果”；

（8）“文武异材，并为大用”与“文武之术，左右惟宜”；

(9) “真伪难分”与“文情难鉴”；

(10) “贵古而贱今”“信耳而弃目”与“贱同而思古”“知多偏好”；

(11) “千载一遇”与“千载其一”。

此外，我们还要举两书雷同之一例如下：《刘子·审名篇》有“东郭吹竽，而不知音”；《文心雕龙·声律篇》也有“若长风之过籁，东郭之吹竽耳。”两书并用“东郭吹竽”。但据《韩子》“南郭处士为齐宣王吹竽”的典故，一般均作“南郭吹竽”，而且历代相沿，终成“滥竽充数”的成语。正因为“东郭”的提法确是罕见，所以不少《文心雕龙》的校勘者，还把“东郭”改作“南郭”。黄侃先生在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中说：“‘南’原作‘东’。孙云：‘《新论·审名篇》东郭吹竽而不知音，袁孝政亦以齐宣王东郭处士事为解；是古书南郭自有作东郭者，不必依《韩子》。但滥竽事终与文义不相应。’侃谨案：彦和之意正同《新论》，亦云不知音而妄成音，故与‘长风过籁’连类而举。章先生云：‘当作南郭之吹竽耳，正与上文相连。《庄子》‘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’此本南郭子綦语，而彦和遂以为南郭事，俚语之文固多此类，后人不知吹于之义，遂加竹耳。’侃仅案：如师语亦得，但原文实作‘东郭’。自以孙说为长。”^{④7}由此可见，两者若不出于一人手笔，又何其相似乃尔？

刘勰一生，从青年时期起，就苦读和研究儒家经典、诸子百家、诗骚辞赋、佛家经论，在写成《文心雕龙》离开定林寺走上仕途之后，担任过起草文书的记室、管理仓库帐目的车骑仓曹参军、太末的县令，管理奏章的通事舍人，管理上林苑警卫的步兵校尉等职务，这些职务位不高，权也不大，但毕竟使他有会遍涉政、军、经、文诸领域的社会实践。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。^{④8}有这样多方面的社会实践经验，加上他有着丰富的文史知识，毫无疑问是他撰写诸如《刘子》这样遍涉政、军、经、文、史、哲内容的著作的基础。如果光是死啃经书，博

学而不达世务，要写出这样的著作恐怕是有困难的。

最后，关于两书的语言风格问题，前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。有的如前所述，认为《刘子》“体与《文心雕龙》相近”，说“其文丰美，颇似刘彦和”。^{④⑨}但也有人以为：“详审二书，颇不相似。《雕龙》文笔丰美，《刘子》文笔清秀；《雕龙》词义深晦，《刘子》词义浅显；《雕龙》于陈言故实多化用，《刘子》于陈言故实多因袭”。^{⑤⑩}真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随取舍之互殊，而有是非之迥异了。我们的看法是：在考察这一问题时，最好不要脱离刘勰文章风格的理论和两书内容和文体的区别。刘勰主张：“设文之体有常，变文之数无方”，^{⑥⑪}“情致异区，文变殊术，莫不因情立体，即体成势。”^{⑥⑫}因而刘勰是十分重视，根据特定的对象和内容来选择文章体裁、运用语言的。《刘子》论的是“治国修身之要”，用的是散体；《文心》论的是“为文之用心”，用的是骈体。内容不同，语体迥异，二者不可机械类比。我们如果首先顾及其内容和形式的区别，再透过现象看其实质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两书的一致所在。比如：两书尽管对象不同，但“论”是相同的。依刘勰对“论”的诠释：“论”是“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”，目的在于“辨正然否。所以在《刘子》和《文心》中，一般都是由材料得出观点，既有推理又有判断，每篇都有结论的。又如，刘勰在语言上是反对使人“弗识”的“诡异”“字妖”的，所以尽管《文心》用的是骈体，在口语化方面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，但他仍然在语言结构方面采取措施（比如运用虚字），尽力使语势流利，从而使骈文同口之语之同缩短了距离，这同用散体写成的《刘子》“浅显”以至被贬为‘俗薄’的语言风格，是一致的。

总之，综合上述诸方面，我们认为：刘昼不可能写出《刘子》，《刘子》为刘勰所著应该给予肯定。当然，这是我们在考证中形成的初步看法。由于我们才疏学浅，所见资料不广，很可能

产生片面和错误，可是，为了响应整理古籍的号召，不揣浅陋斗胆提出管见，抛砖引玉，向专家和读者请教。

注释：

- (1) (3) 明万历五年刊《子汇》本《刘子·序》。
- (2) 《刘子·九流篇》。
- (4) (5) (6) 《四库全书提要·刘子》。
- (7) (16) 明万历二十年吉府刻《二十家子书·刘子序》。
- (8) (9) (10) (11) 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辩证》中卷子部《刘子》。
- (12) 王重民：《敦煌古籍叙录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6、218页。
- (13) (23) (51) 王叔岷：《刘子集证自序》台北出版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三十三本。
- (14) 侯外庐主编：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二卷下册。三联书店版第880页。
- (15) 上引并见《北齐书》和《北史》刘昼本传。
- (17) (18) 引自开明书店制版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5045、5047页。
- (19) 章宗源：《隋书经籍志考证·七录十二卷》开明书店制版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5004页
- (20) 姚振宗：《隋书经籍志考证·梁刘子十卷》开明书店制版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5513页
- (21) 杨明照《梁书刘勰传笺注》杨校《文心雕龙》第9页。
- (22) (48) 黄侃：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、110页。
- (24)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。
- (25) 同上书，第四卷343—344页
- (26) 鲁迅：《题未定草（七）》
- (27) 刘永济：《文心雕龙校释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页。
- (28) 范文澜：《中国经学史的演变》载《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》第283页
- (29) (30) (42) 汤用彤：《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525、419页。
- (31) 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册第480页。
- (32) (33) (34) (35) (36) (37) (48) 并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：《诸子篇》、《序志篇》、《程器篇》、《知音篇》
- (38) 《梁书·刘勰传》
- (39) 纪昀：《文心雕龙·程器篇》评语。转引自周振甫《文心雕龙注释》第526页。
- (40) 鲁迅：《摩罗力诗说》

- (41) 鲁迅：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》
- (43) 王元化：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
- (44) 宋濂：《诸子辨》
- (45) 蒋以化：《刻〈刘子〉引》
- (46) 李维桢：《刘子叙》
- (49) 分见龙川精舍抄本《刘子跋》和《抱经堂文集·刘子跋》
- (51) (52) 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：《通变篇》、《定势篇》

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成立

第二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暨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成立大会，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。这次会议是继一九八三年成都首届会议之后，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，与会人数之众，提供学术论文之多，讨论问题之热烈，受到有关方面之重视，是建国以来所仅有的，它充分体现了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关怀下所出现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之繁盛景象。会议充分肯定了深入探讨这部优秀古典长篇小说名著的现实主义，指出它所广泛涉及的政治学、军事学、社会学、人才学，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思想内容，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，它所讲的是一朝一代的国家大事，鼓励的是武勇和智慧，歌颂的义仁君贤相，对它进行分析、研究评价和借鉴，是十分必要的。同时，它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十分成功的章回体开山之作，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，认真地研究它的艺术成就，和创造方法也无疑会大大有助于我们今天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。会议就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和版本源流，它的主题思想，创作方法上的“虚”与“实”，艺术成就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，各行己见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，并希望展开争鸣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再前进一步，有所突破，如人物形象类型化还是个性化典型问题，人物论，成书、作者、版本问题，毛批本问题等。会议一致推选陆定一同志为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的名誉会长，刘世德为会长，章培恒、谭洛非为副会长，聘请孙楷第、吴组湘、赵景深、陈述冬、范宁、顾学颉、王利器、缪钺、任访秋、周邠为学会顾问。会议决定第三周年会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镇江市举行。为了推动研究，学会要建立资料中心，编制资料索引和编辑出版建国以来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论文选、港台地区论文选和外国研究论文选，出版学刊和内部刊物。

· 刘宣 ·